



天津通史资料丛书
总主编 万新平

天津史研究论文选辑

刘志强 张利民 主编

下编



天津古籍出版社



天津通史资料丛书
总主编 万新平

天津史研究论文选辑

刘志强 张利民 主编

下
编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天津史研究论文选辑 / 刘志强, 张利民主编.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9. 9
(天津通史资料丛书 / 万新平总主编)
ISBN 978-7-80696-732-4

I. 天… II. ①刘… ②张… III. 天津市—地方史—文集
IV. K29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57880号

天津史研究论文选辑

刘志强 张利民/主编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http://www.tjabc.net>

E-mail:tjgj@tjabc.net

三河市富华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04.5 字数 3300千字

2009年9月第1版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696-732-4

定 价: 350.00元 (上下编)

总序

· 万新平 ·

盛世修史是我国的文化传统。编纂《天津通史》是我市广大干部群众和专家学者久已期盼的文化盛事。2004年12月,在纪念天津设卫建城600周年之际,天津市委决定正式启动《天津通史》编纂工作,可以说是跨入21世纪后天津历史学界乃至社会科学界的一件大事,是一项具有重要历史和现实意义的划时代的文化建设工程。

《天津通史》作为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研究项目,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唯物史观为主导,完整把握天津历史发展的脉络,全面分析天津历史变迁的特征,深入总结天津发展的规律,深刻论述天津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这项工程对进一步推进天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挖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推动文化建设和学术研究的发展,进而提高天津城市文化品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编纂地方通史历来是一个地区文化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近年来,地方通史编纂工作方兴未艾,北京、上海、重庆、河北、山东、山西、湖北、贵州等省市都相继编辑出版了大型地方通史。天津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有许多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和特点。在古代,天津从军事重镇逐步成为畿辅名城,具有中国封建城市发展的重要典型意义。在近代,天津是近代中国的缩影,“近代百年看天津”,确实如此。比如,天津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战略要地,是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重要战场,是近代中国政治势力角逐的主要舞台,是近代中国海陆军建设的重要基地,是中国北方城市近代化的发源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北方白区革命斗争的重要中心,是中国北方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口岸和工商业经济中心。中西社会思潮在此交汇,新式文化教育由此兴起,一批思想家、教育家和文人巨匠聚集津门,从而形成吸纳百川、包容中外的社会环境和历史底蕴。建国后,在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天津克服了国内仅见的艰难曲折,取得了现代化建设的显著成就。改革开放以来,天津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的新时期。特别是市委、市政府提出实施“三五八十”四大奋斗目标和“三步走”战略后,经过全市人民的顽强拼搏和艰苦奋斗,不断取得辉煌的成绩,迎来了天津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滨海新区的发展被正式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不久的将来,一个崭新的天津将引领环渤海地区的发展,天津将成为渤海之滨一颗璀璨的明珠而为全球所瞩目。

回顾历史,在中国社会由一个建基于古老农业文明之上的传统社会,逐步向以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为标志的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进程中,天津占有突出的地位,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拥有极为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中国城市发展进程中的成就与局限、经验与教训、发展与曲折、突破与障碍,都集中反映到天津这一历史文化名城身上,致使天津的演变成为中国城市变迁的重要代表。通过编纂《天津通史》,对天津历史进行深入的研究;可以更深刻地认识中国城市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不仅可以深入地研究天津、认识天津、展示天津,

而且可以更深入地研究中国、认识中国、展示中国。

编纂《天津通史》，是一项汇聚集体智慧和力量的系统工程，是在前人基础上的升华和提高，是在新的起点上的开拓和创新。因此，必须牢固树立精品意识，力求在理论构架、学术观点、研究方法和史实资料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必须组织一批素质优良、功力深厚、作风扎实的专家学者集体攻关。因此，从专题研究着手，从基础资料起步，是做好该工程的基本路径。要坚持对天津历史发展进程进行全方位、综合性的研究，把各个时期、各个阶段天津地区变迁的历史全貌，真实地加以展现和记述，深入地总结天津城乡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发展进程。不仅要研究和叙述天津的规模、形制、建筑和环境，更需要研究和分析其经济特征、文化渊源、社会结构、人口变化、居民素质等发展和演变的内涵；不仅要注重天津与乡村、市镇，乃至华北、西北、环渤海地区的关系和互动，还要关注天津与国内其他区域中心城市、东北亚，乃至世界各国的相互关系；不仅要着重叙述天津本身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诸方面的演变史实，并从中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带有规律性的认识，还要反映出不同时期天津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要高度重视天津历史资料的搜集和积累。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应该看到，前人已经收集整理了大量的天津历史资料，但从编写大型多卷本通史的需要来看，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如历代实录、通鉴、类书、文集、方志中有关天津地区的史料，开埠以来各个时期的大量档案文献，特别是散失在国外档案馆和私人收藏的各国租界、领事馆、教会的文件、报告、调查、私人日记等，近现代中外文报纸杂志的记述，以及考古和现存文物资料等等，都需要进行全面系统的征集整理工作，以使《天津通史》编纂工作建立在坚实完备的史料基础之上。

为此，我们根据《天津通史》编纂工作的需要，将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天津历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汇编为《天津通史专题研究丛书》；将经过专家整理的较为珍贵的中文历史档案和文献资料选编为《天津通史资料丛书》；将征集到的有重要价值的外文历史档案和书刊资料编译为《天津通史编译丛书》；将征集到的有重要价值的外文历史档案和书刊资料编译为《天津通史编译丛书》。这三种丛书的编辑出版，不仅有利于提高《天津通史》的研究和编纂工作水平，同时可以把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和珍贵的历史资料及时介绍给学术界和广大读者，对深入地了解天津，认识天津，研究天津，将发挥积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编 辑 说 明

根据《天津通史》编纂工作需要,我们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研究天津史的学术论文中选取部分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论文,汇编为这部《天津史研究论文选辑》,供有关学者研究使用。收录的时段为 1949 年至 2007 年。学术论文主要选自中国公开发行的期刊,少数论文选自内部发行的期刊和论文集,并注明发表的期刊名称、年份与卷期。发表在各类报纸上的论文仅收入 1957 年以前为数不多的有一定学术性和代表性的论文,天津与各地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未列入选编范围。

《天津史研究论文选辑》收录的论文基本保持原貌,文中明显的错字、笔误做了必要的改正,对个别论文中与学术研究无关的文字有所删节,统一中华民国以前纪年方式,论文的注释均统一为文末注。

《天津史研究论文选辑》的排序未采用分类的方法,皆以论文发表的时间排序,同年按刊名音序排序,同一年同期按卷期排序。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为 1949 年至 1989 年的科研成果,下册为 1990 年至 2007 年科研成果。

在本书编辑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天津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天津市图书馆、天津古籍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目 录

下 编

曹禺与天津	赵 路(847)
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	吉石羽(849)
国民党政府对天津敌伪产业的接收	汪寿松(856)
近代天津商业腹地的变迁	陈 克(860)
旧中国的天津口岸	赵禹辰(868)
日本华北驻屯军及其侵华行径	武月星(873)
天津的商业招幌	尚 洁(880)
周学熙与华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唐少君(883)
北洋新政与华北城市近代化	胡光明(889)
近代天津城市史散论	罗澍伟(904)
近代天津第一个城市整体规划——介绍《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	李 森(915)
近代天津工业结构的演变与城市发展	刘海岩 周俊旗(919)
略论天津方言岛	李世瑜 韩根东(928)
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	张利民(933)
清代周盛传小站屯垦述略	郭鸿林(948)
通商口岸与近代文明的传播	陈振江(954)
长芦盐业史述略	孟 庆斌(962)
从历史看天津音乐文化的主要特点	陈嘉瑞(967)
略论周学熙实业集团的经营管理思想	张洪祥 马陵合(972)
论启新洋灰公司的经营特点——周学熙集团企业个案研究	欧阳跃峰(977)
试论近代华北的区域城市系统	罗澍伟(983)
张学良与张伯苓	梁 吉生(989)
从单核增长到城镇同步发展——天津城市化模式	任云兰(993)
日本占领天津时期市民的生活质量	周俊旗(998)
天津事件新探	郎维成(1004)
洋务运动与津、穗、汉、沪四城的早期近代化	姜 锌(1009)
安福系“财神”王郅隆	张玉芳(1017)
沦陷时期天津四作家论	张 泉(1019)

论清末商会对长芦盐务风潮的平息	胡光明(1024)
20世纪30年代前天津人的生育观念、生育习俗	顾道馨(1030)
七七事变后占领天津的日本侵略军	王凯捷(1035)
长芦盐区的由来及其演变	芮和林(1039)
20世纪初期天津金融风潮及其对对外贸易的影响	吴必龙(1042)
京津唐地区金代人口变迁研究	唐亦功(1050)
李叔同与近代天津文化的渊源关系	章用秀(1056)
明清时期海河流域的农田水利	张 芳(1062)
清季天津对外直接贸易简论	吴弘明(1070)
清末铜元危机与天津商会的对策	赵洪宝(1076)
天津的开埠与英租界的形成	刘海岩(1083)
天津的洋务企业与社会环境	宋美云(1088)
五四运动中天津商人罢市、抵制日货问题考察	李学智(1094)
北洋时期天津商会政治文化试析	宋美云(1101)
北洋新政体制下地方自治制度的形成——天津县各级议事会的成立及其权限	[日]贵志俊彦著 周俊旗译(1107)
近代天津城市规划布局的演变	李 森(1118)
论近代天津市民文化的兴盛	尚克强(1124)
明朝的天津巡抚及其辖区	靳润成(113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天津妇女社团	田 敏(1133)
源于满语的天津方言词汇	顾道馨(1136)
周馥与洋务运动	吴宏爱(1141)
理门与近代华北集镇社会——天津独流镇理门调查分析	程 嘸(1145)
论庚子大沽口之战	戚其章(1154)
论卫派文化的移民特征	郭武群(1161)
清代前期的沿海贸易与天津城市的崛起	许 檀(1164)
天津文化与天津城市论纲	陈 雍(1174)
五四运动期间的天津总商会	朱 英(1178)
关于天津抗战的日期问题	陈德仁(1184)
明清政府与天津社会经济变迁	徐永志(1187)
天津开埠初期的洋行与买办	庞玉洁(1191)
中国近代第一所陆军军官学校——天津武备学堂	冀满红(1195)
北京—天津城市文化之比较	王兆祥(1197)
20世纪上半叶北京和天津城市土地利用扩展的对比研究	罗海江(1203)
乱世:天津混混儿与近代中国的城市特性	关文斌著 刘海岩译(1208)
论20世纪前期天津钱庄业的繁荣	林地焕(1219)
上海、天津近代城市文化比较浅析	郭武群(1229)

天津的近代初等学堂与绅商	朱 鹏(1234)
近代天津商会与国内其他商会网络机制的建构	宋美云 宋立曼(1250)
西北近代经济外向化中的天津因素	樊如森(1256)
1917年的大水灾:天津与它的腹地	李明珠著 任云兰译(1265)
华北城市的粮食供给结构——以天津斗店为中心	[日]浜口允子著 汪寿松译(1278)
明代天津人口与城市性质的变化	高艳林(1287)
清代以来广东人在天津的经济活动	刘正刚(1293)
清末新政时期华北近代教育的兴起	万新平(1302)
天津租界日本居留民社会及其意识	[日]桂川光正著 史丽华译(1318)
外国人在天津租界所办报刊考略	于树香(1331)
“迷拐”、“折割”传闻与天津教案	董丛林(1335)
20世纪上半叶天津娼业结构述论	江 沫(1345)
关于天津区域文化形象的思考	陆桂敏 高 展(1359)
19世纪天津、烟台的对外贸易与传统市场网络——以洋纱洋布的输入与运销为例	张 思(1362)
北洋时期天津的宪政改革	郭剑林(1376)
从军事卫所到经济中心——天津城市主要功能的演变	张利民(1381)
划定天津日租界的中日交涉	张利民(1389)
甲午战争时期的天津《直报》及其对战后的舆论导向	徐建平(1395)
近代华北自然灾害与天津边缘化的贫民阶层	刘海岩(1400)
近代商会研究新视角:商会网络运行机制——以清末民初天津商会网络为个案	应莉雅(1406)
抗战时期华北日系农场的殖民经营——以天津地区为中心	张会芳(1411)
民国时期天津物价变动原因探析	高 展(1424)
明代天津卫城城区建设考略	王伟凯(1429)
商会与清末民初天津城市社会生活的进步	庞玉洁(1438)
天津开埠对腹地经济变迁的影响	吴松弟 樊如森(1446)
袁世凯、徐世昌与天津地方自治	郭剑林(1456)
20世纪初天津的金融风潮及其应对机制	龚 关(1461)
从北洋三口发展的历史脉络看中国近代化历程	许 檀(1476)
解开天津右卫创建史上的两个谜团	南炳文(1481)
论清末警察与直隶、京师等地的社会文化变迁——以《大公报》为中心的探讨	王先明 张海荣(1487)
民国道荒与战乱期间天津城市的社会救助(1912—1936年)	任云兰(1501)
试论明清长芦盐业重心的北移	刘洪升(1507)
试论清末天津警察制度的创立及其对城市管理的作用	涂小元(1512)
引进 扶植 辉煌——论天津早期的话剧演出活动	郭武群(1519)
近代城市贫民阶层及其救济探析——以天津为例	任云兰(1523)
论华北灾荒期间天津商会的赈济活动(1903—1936)——兼论近代慈善救济事业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任云兰(1531)

清末民初天津工商同业研究所初探	朱 英(1538)
试论民国时期京津两市婚姻自由的实施进度	王印焕(1545)
天津近代文学与公共文化空间	张宜雷(1553)
中国近代外贸埠际转运史上的上海与天津(1866—1919)	唐巧天(1557)
租界、社会变革与近代天津城市空间的演变	刘海岩(1567)
“新政时期”天津城市管理的近代化变迁	王良胜(1573)
北洋新政时期天津中医界的改革活动与地域社会	[日]户部健(1577)
从“公推”到“票举”:近代天津商会职员推选制度的曲折演进	朱 英(1590)
近代天津会馆房地契约与诉讼习惯研究	宋美云(1600)
商业贸易与民国前期天津和腹地间的资金流动	龚 关(1606)
天津近代城市文化转型时期妈祖文化的特点	方广岭(1615)
义和团时期京津下层平民心态研究	袁志海(1619)
元明清政治经济格局与海河流域水利发展	李红有(1622)
下编附录	(1625)
后 记	(1650)

下 编 ►



曹禺与天津

赵 路

一个戏剧家的成长,和他所接受的教育,特别是有关戏剧知识的启蒙教育是至关重要的。曹禺虽然祖籍是湖北,但他出生在天津,并在天津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的生活给他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的南开剧运,不但给予曹禺以系统的戏剧启蒙教育,而且改变了曹禺的生活历程,使他走上了终生从事戏剧创作的道路。可以这样说,南开是产生大戏剧家曹禺的摇篮。

众所周知,中国的话剧运动是从 20 世纪初开始的。“春柳社”和以上海为中心的南方话剧运动、以天津南开新剧团为中心的北方话剧运动,奠定了中国话剧发展的基石。1909 年开始的南开剧运已经远远超过了校园的业余活动的范围,而是走向了社会。从 1909 年南开话剧团上演第一个话剧《用非所学》开始,直至 1922 年,南开新剧团共上演了近 50 个剧目,这是南开新剧团活动最旺盛的时期,上演的剧目大都是反映新潮,具有鲜明的反封建内容,且大都是自己编导的。除此之外还介绍了果戈理的《钦差大臣》、王尔德的《少奶奶的扇子》(均为 1921 年),并于 1928 年上演了易卜生的《国民公敌》和《娜拉》。南开剧运一开始即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并有较完整的戏剧观念。注重演剧的社会功效,提出“感昏聩,化愚顽,开民智,进民德”。强调新剧的本质特征——“语言通畅,意念深远,悲欢离合,情节昭然”以及写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张彭春这位被曹禺称为戏剧启蒙导师的出现,将南开新剧团的演剧活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张彭春这位同胡适、赵元任一起赴美留学攻读哲学和教育学的博士,知识渊博,对戏剧有着精深的研究。他于 1916 年担任南开新剧团的副团长以后,不仅系统地介绍了西洋戏剧知识,而且排练了众多的剧目。他不仅会编剧,而且擅长导演艺术。他对德国表现主义大导演莱茵哈特、苏联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英国导演戈登克雷,都有着精深的研究。曹禺就是在这样一位有学识、有经验的导演的指导下开始他的戏剧生涯的。

曹禺从出生至 1930 年进入清华大学为止,20 年是在天津度过的(清华毕业后,又回到天津女师任教,并继续参加南开新剧团的活动)。他的成名的处女作《雷雨》虽然是在北京清华大学学习时完成的,但却是孕育在天津,并取材于天津。《日出》从人物到语言更有着明显的天津的地域特色。曹禺虽然否认《雷雨》写的是天津封建世家、八大家之一的周家,但他同时也承认他的家庭和周家过从甚密,而且承认《雷雨》的第三幕的鲁贵家,直接取材于天津老龙头车站外的贫民窟。至今仍然存在的惠中饭店,这一 30 年代为高等妓女集中的场所,为《日出》中陈白露的生存环境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早已成为历史陈迹的天津南市妓院,构成了《日出》第三幕的原型。1985 年有一次,我陪同曹禺路过天津惠中饭店,我曾问曹禺“这就是您写的惠中饭店!”他说“不错!但我把它提高了!升格了!”这是作家出于典型化的需要。当然,把艺术作品和生活原型加以简单类比和套用未免显得过于肤浅,但今天我们研究曹禺的创作生活,了解他创作素材的原型,对于更深刻地认识作家,仍然是有意义的。

天津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缩影,是北方的大工业城市。20 世纪初,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天津租界林立,租界面积相当于旧城的八倍,清朝遗老、王公、贵族,下野的军阀、政客,新兴的买办、富商,云集天津,在租界里过着穷奢极欲的寄生生活。曹禺出身于封建官僚世家,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生活有着深切的感受,这在他的作品中有着明显的表现。至于《日出》中的翠喜这一闪烁着人性美的下层妓女的形象,更有着明显的天津地域特色。如果说《北京人》再现的环境里具有浓厚的京味的话,那么《雷雨》《日出》则有鲜明的津味,这和曹禺青少年时代在天津的生活不无关系。

曹禺的几部作品不仅取材于天津,而且首演于天津,《雷雨》的演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益世报》《大公报》等大报纷纷发表评论。当《日出》刚一在文学季刊上发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就多次发表集体评论,而当时参加评论的又都是著名的作家、评论家,如茅盾、孟实(朱光潜),叶圣陶、沈从文、巴金、靳以、黎烈文、荒煤、李蕤等。这些舆论界和文艺界的名流参加评论,形成了浓重的文化氛围,对曹禺的成长无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曹禺的作品将作为中国话剧史上的经典著作载入中国的话剧史册。曹禺这位天津出生,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戏剧家将永远镌刻在天津的文化史志上。

(《中国戏剧》1990年第12期)

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①

吉石羽

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是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迄今为止，我们对此所得到的，只是“天津新造之邑……人民大率由迁徙而集”^②；“五方之民所杂处”^③；“比闾而居者，率多流寓之人”^④等浅层概念。现存有关天津的诸种旧志中，均有“户口”一门，但中国传统社会的人口统计，多是为了确定丁税额数，隐匿及任意填造之弊，在所难免，自然不可能精准。如康熙二年、十年（1663年、1671年），天津人丁除老弱逃亡外，共3 282丁^⑤。这个数字对于了解当时天津的城居人口状况，并没有多少价值。

传统期天津城市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精确的人口普查，约开始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整个数字公布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刊行的《津门保甲图说》一书，其中这一时期天津城居人口共有32 761户，198 716人。是书虽没有告诉我们这次人口统计的具体方法，但从全书的内容及编纂目的来推测，户、口两项似乎来自严格指导下的自下而上的申报。由于组织的严密和一定的行政效率，其准确性要比后来那种虚应故事的户口调查高得多^⑥。当时所应用的方法，就是今日社会学所应用的社会调查方式之一的普查（全面调查）法。这在当时的条件下，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

人口是社会物质生活的必要条件之一。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生命个人存在。”^⑦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的成长过程，也就是人口的集中过程。因此，对传统期天津人口做一些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探析，对于我们加深认识天津城市历史及人口发展的特点，无疑会有相当的帮助。

一、金元时代天津城居人口条辨

根据近年来考古发掘的成果，证明天津附近的农村聚落，大约出现于新石器时代。到战国时，此种聚落已相当发达；县一级的行政管理中心，在西汉初年也纷纷建立。然而，天津作为沿河近海、水陆交通枢纽的初期城市约出现于金代，这就是史书上的直沽寨或信安海壩。这时期城居人口，似以军伍为主。

到了蒙古统治这一地区后，制盐业首先在直沽发达起来。据元人王鹗所书《三叉沽创立盐场碑》：“甲午之秋，三叉之地未霜而草枯，滩面宽平，盐卤涌出，或经日自生，时人指以为瑞，遂相率诉于官，按验得实，受旨煎造。初得旧户高松、谢实十有八人，岁不再易，招徕者日众。河路通便，商贩憧憧往来，是年办课五百余锭，比之他场几倍之。”^⑧这是一条有关天津早期人口十分珍贵的史料。这里的甲午系指蒙古太宗六年（1234年），时距直沽寨地名的出现（金贞祐二年，即1214年）仅20年。它至少告诉我们：一、三叉之地盐卤涌出后即为时人所见，说明这一带已有人居住；二、“相率诉于官”，则证明这里或附近已建立起管理系统；三、高、谢等户为这里的旧有居民；四、因为运输便捷，这里人口聚集很快，商贩往来频繁。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到了至元五年（1268年），这里已是“人得安业，盐如山积”^⑨。王鹗此碑，即因受当地耆老夏庆、温资甫、梁温全、崔居仁等的再三恳祷而书^⑩（这些人应属当地居民的“布衣领袖”）。不久元王朝即在此设三叉沽、大直沽二司管理盐务，直至明朝中叶，这里仍是“万灶沿河而居”^⑪。其人口虽无确数，但考之清代丰财一个盐场即用夫3 000左右^⑫，且为滩晒；当时制盐全为煎造，用夫当不止3 000之数，合之眷口，每司总应在万人上下。天津最早的城居人口，发轫于大规模的制盐，而且相当集中。通过上面分析，可见一斑。

元朝初年，随着南漕北运的大规模进行，天津城市加快了成长步伐。因为从江南调运的大批漕粮在进入大都之前，都要在直沽交卸转运，漕船在三岔河口一带聚泊，连樯万艘，水手云集。届时朝廷还要派出大批官吏和军队来到直沽，并先后建立起接运厅、临清万户府、镇抚司等机构，同时修筑了仓廒、庙宇以加强城市的社会控制；并派军卒在直沽周围地区屯种戍守。“舟车攸会，聚落始繁”。人口的大量聚集，为直沽带来了诸

多的社会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商业交换因而发展起来;各种物资的大批到来,又吸引了远近的商人,被认为方便的地方逐渐成为热闹的市廛。“一日粮船到直沽,吴粟越布满街衢”。地处卫河之滨的侯家后一带,则是天津最早的居民区。《续天津县志》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李湜字怀芳,乾隆壬申举人……尝自署门帖云‘天津卫八十三龄铁汉子,侯家后五百余载旧人家’”。《志余随笔》的作者高凌雯独具慧眼,对此做了一个深入浅出的分析“怀芳中乾隆十七年举人,假定发科时为25岁,至嘉庆十五年方足83之数。由嘉庆十五年上溯至国初,得166年,益以明祚277年,凡443年。若是,则李氏居是土,当在元之中叶,真沽上人家之最旧者也;以此又知侯家后一带开辟较早,当元设海津镇以前,已有沿卫河之滨,结邻而居者矣。”^⑬《天津县志》称“天津向只七姓”^⑭,该志书的作者之一汪沆还作诗说“海津作镇剧苍凉,七姓残元始启疆。”^⑮这七姓很可能就是最先定居于直沽的七个较大的家族。

为了保障漕粮转运以及大都的安全,元王朝还在直沽常年驻有军队。天长日久遂使直沽出现了“兵民杂居”的状况。元人傅若金的《直沽口》一诗中说“转粟春秋入,行舟日夜过。兵民杂居久,一半解吴歌。”^⑯按傅若金生于元大德八年(1304年),卒于至正三年(1343年),以此推之,此诗必成于元中叶以后。“兵民杂居”应是金元时直沽人口的另一个显著特征,而且这些人口中有相当部分沿运河或海路来自南方各省,且通当地方言。只是因为文献的无证,我们无法更清楚地揭示早期天津人口的来源与构成了。

二、明初天津卫人口来源管窥

从历史上看,天津城居人口有两次大的聚集过程,一次是在永乐初年,另一次是在满族入主中原以后。尤其是明王朝在永乐二年(1404年)于直沽设卫筑城之后,调来了官、军二籍充实天津卫城。因为依明代定制,卫指挥史以下例许世袭,即子孙各承其职。这批人到来后,枝叶繁衍,遂成为天津城市的常居人口。当时直沽设有三卫,按军制每卫有军士5600人,三卫合计为26800人。这些军士中80%屯种,20%守城。因为军籍为繁多,志书无法通载,所以仅记录了附于官籍之人的姓名,籍贯^⑰。据《天津县新志》“录名官籍者三百有九”,实际上《天津卫志》及《天津县志》仅载有308人。细检之,则少一籍贯不明之迟姓。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职业和社会地位总要不断变动,有些人上升,有些人下降。及至清初,这些家族几乎凋零殆尽;到了清末,能上溯其宗族者仅有梅、费、赵、倪、殷、黄、靳、张、李、冯、杨十数姓^⑱。这三百余人,被称为“天津户籍最早者”^⑲。现据《天津卫志》,将这308人的籍贯按省份做一统计,其中有13人籍贯不详,下余295人,以来自各该省人数多寡为序。

籍隶省份	所属州县	人 数	占统计人数的%
安徽	27	84	28.5
江苏	26	54	18.3
山东	26	38	12.9
河北	16	31	10.5
河南	14	22	7.5
浙江	12	18	6.1
湖北	9	14	4.7
湖南	9	10	3.4
陕西	5	8	2.7
山西	3	3	1.0
福建	3	3	1.0
江西	2	2	0.68
广东	2	2	0.68
云南	2	2	0.68
贵州	2	2	0.68
广西	1	1	0.34
内蒙	1	1	0.34
合计	17	160	529
			100.0

上面的统计与概率,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也有一定的任意性,似属于社会学上的非随机偶遇抽样。如何保证该样本对于总体的代表性,虽无十分把握,但这一结果仍有助于我们对明代天津城居人口的观察与研究。如与旧志书的记载相验证,它至少可以说明如下一些问题:

一、明代天津城居人口来源广泛。据上列资料可知来自全国 17 个省份的 160 个州县。明代人所见天津一地“杂以闽越吴楚齐梁之民、风俗不甚统”^②,是有充分依据的。这种以地缘关系为主的人口机械聚集,无疑具有一定的进步性。来自各地的家庭,带来了各自的长处,居住在一起,不但互助精神极强,而且可以相互学习或联姻,有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卫志》说,天津居民“贵德、耻争、民纯、讼简”^③,就是这种良好的社会关系的反映。

二、来自安徽和江苏两省的人口,几乎占了一半(46.8%),而其中来自安徽合肥的有 16 人,来自江苏江都的有 12 人,这两处合起来又几乎占了被统计人口的 1/10(9.5%)。不少语言学家认为,天津的方言乃是一个方言岛,它并非由周围某种方言演变而来,很可能源于明初安徽东部和江苏北部的方言。上面的统计,能不能为这些语言学家提供一点有价值的参考呢?

三、尽管明代的天津卫是以军事城堡的面貌出现的,但终究掩盖不住其固有的经济城市的特质。尤其是明中叶以后,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极大地动摇了卫城的封闭性,加速了城居人口的社会流动,閥阅相望的官籍族姓,迅速散乱零落,大批新鲜人口进入城市,为城市增添了新的血液与活力,这是天津城市能够在日后不断向上发展的内在因素之一。

三、清中叶以前天津城居人口再聚集的检讨

清代顺康之际,是天津城居人口的又一次聚集过程。如果说明初调来的官、军二籍,是一种强制性的聚集,那么清代初年人口大量流入天津,则纯属自发性的聚集。其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城市商业的发达,吸引了大批流寓人口,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康熙初年《天津卫志》的编者在阐述这一情况时说“本卫土著之民凋零殆尽,此间而居者率多流寓之人。是津门虽属商贾凑集之地,而土著者不得获其利焉。”^④曩时,卫城居民保举有德有年之乡耆一正一副,每逢朔望,在涌泉寺宣讲邻里条规,平息相互纠纷。至是因新旧人口交替迅速。互不相认,这一不成文法亦难以维持。有人估测说“津邑居民,自顺治以来,由各省迁来者十之七八”^⑤。有人甚至认为天津“无所谓土著”^⑥。为了检讨这一迁徙状况,现从旧志中录出 66 人,分 10 类排比如下:

- 一、鼎革隐居
 - 1. “李氏为燕旧族,自始祖万良公因避器自京移寓津门,遂家焉。”
 - 2. “于京字岱瞻,别号无欺道人,静海增广生。明鼎革,迁居天津南门内,绝意进取。”
- 二、业盐或经商
 - 3. “张霖字汝作,号鲁庵,晚自号卧松老纳,其先抚宁人。父希顺,顺治间行盐长芦,遂家天津。”
 - 4. “李泳鸿字云亭,号秋帆,浙江山阴人,业盐来津,遂家焉。”(在乾隆年间)
 - 5. “金玉罔字西昆,号芥舟,晚号黄竹老人,祖平,始迁自浙江之会稽,业盐起家。”
 - 6. “杨光仪字香吟,晚号庸叟。先世自浙之义乌迁静海,曾祖世安始迁天津,业盐富致。”
 - 7. “安尚义字易之,其先世本朝鲜人,入籍奉天,寓天津。”(徙家在康熙四十七年)
 - 8. “查日乾字天行,一字惕人,本顺天宛平人。少孤,随母寄姐家江南。既长,来家天津……以行盐致富。”
 - 9. “愈懋字天行,浙江绍兴人,顺治壬辰武进士”。 “以副将乞休,家天津,业盐。”
 - 10. “王又朴字从先,号介山,江南仪征人。六岁随父北迁。父业贾……又朴入籍,补卫学生。”
- 三、居官或致仕后定居
 - 11. “胡捷,字象三,大兴诸生。父为河西务关掾。康熙元年务关徙天津,移家偕来,遂为天津人。”
 - 12. “邵氏……顺治初务关掾,康熙元年务关移天津,与之偕来,遂入籍。”
 - 13. “武嵩龄,大同人,明季官指挥金书管城守营事,擢辽阳都司。鼎革后,以天津为其旧治,移家居焉。”